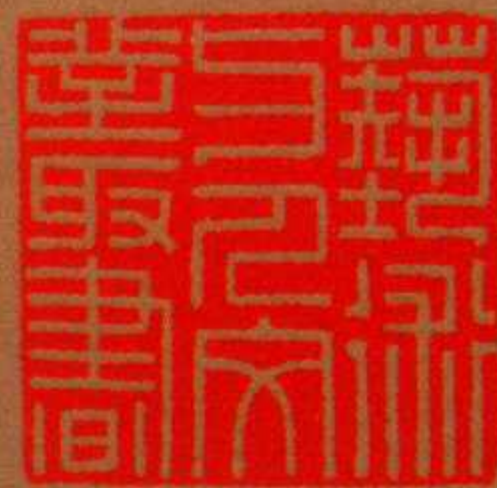


艺术与人文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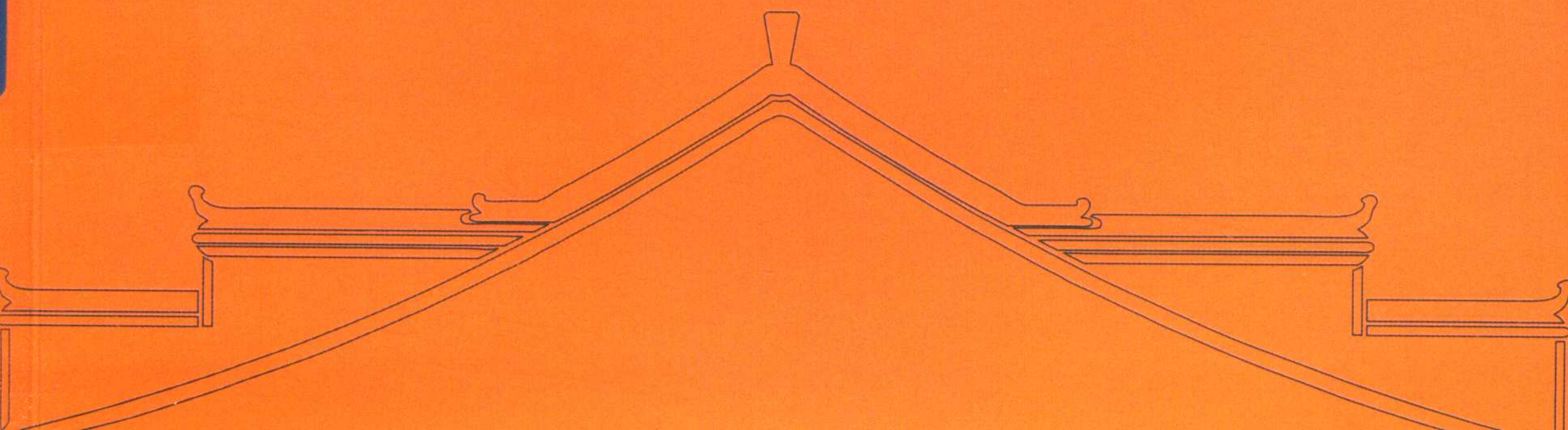


# 空间、 手工艺和仪式

农耕文化的整合记忆

胡绍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手艺是一种记忆，仪式也是一种记忆。它们以时间为轴线整合进乡村社会空间中。在时间的编织中，村落成为了农耕文化整合性记忆的重要载体。本书以传统农耕社会中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为对象，大致围绕空间、手艺和仪式三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田野观察和思考，尝试梳理鄂东区域社会中关于传统农耕文化的记忆，藉此表达对智慧而善良的世代农耕人的敬意！

ISBN 978-7-5321-7438-6



9 787532 174386 >

定价：56.00 元

艺术与人文丛书



# 空间、手工艺和仪式

农耕文化的整合记忆

胡绍宗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间、手艺和仪式：农耕文化的整合记忆/胡绍宗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12  
(艺术与人文丛书)

ISBN 978-7-5321-7438-6

I. ①空… II. ①胡… III. ①传统农业—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F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第265109号

发行人：陈 徽  
策划人：杨 婷  
责任编辑：李 平 程方洁  
封面设计：姜 明  
图文制作：张 峰

书 名：空间、手艺和仪式：农耕文化的整合记忆  
作 者：胡绍宗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0.75  
字 数：269,000  
印 次：2019年12月第1版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I S B N：978-7-5321-7438-6/C·0068  
定 价：56.00元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 资助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鄂东民间手工艺人口述史研究》

(编号: 16CAJ760009)



## “艺术与人文丛书”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

王立兵 陈向军

主 编

胡绍宗 廖明君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志斌 王立兵

王 锋 方圣德

刘晨晨 许晓明

李修建 汪小洋

张士闪 陈向军

陈孟昕 胡绍宗

钟劲松 袁朝晖

黄厚明 彭 锦

程 征 廖明君

## 总 序

---

在中国地形图上，大别山就像一只从西北向东南爬行的巨大蝎子，它的尾巴经桐柏山断断续续与秦岭山脉相连，横亘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与华北平原之间，成为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也成为中国北方与南方之间重要的地理分界线。

大别山地势较高，南北两侧水系较为发达，分别注入长江和淮河，其西南山麓包含着整个鄂东地区。由大别山主脉发源向西、向南以及向东注入长江的主要河流有倒水、举水、巴河、蕲河、浠水等五大水系，每一个水系都接纳了很多支流。这里是鄂东农耕先民们世代繁衍生息的地方，自古就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地理单元。它背列重山，襟带大江，据云梦洞庭之阔，扼长江东去之喉，具有承东启西、纵贯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地理优势。在历史上，鄂东大别山的东、西部就是北方文化南迁的重要通道。鄂豫交界的南阳盆地是接纳隋唐以前关中及中原族群南来长江及以南地区的重要通道。从这里出发，经过襄阳，一条路线是顺着鄂中大洪山西边，沿汉水下游，过荆州，入洞庭；另一条路线是走大洪山以东，穿过“随枣走廊”，进入今天的鄂东大别山丘陵地带。

自古以来，鄂东就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南北通达的“光黄古道”与东西纵横的长江漕运在这里划上了一个呈东西南北通达结构的交汇点。元末明初之后，来自江西的移民从这里开始了长达几百年“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随后朱明王朝不懈的军垦运动，进一步奠定了鄂东山地、河湖、洲畈地区早期人口分布的格局。明中后期开始至清康熙朝，鄂东蕲、黄两府的经济和人口一起快速增长。

复杂的人文地理历史背景书写了深厚的鄂东民间文化。这里孕育了一大批在中国历史文化各个领域有影响力的大家。如中国佛教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昇，医圣李时珍，现代地质科学家李四光，文化学者与民主战士闻一多，国学大师黄侃，哲学家熊十力等。苏东坡谪居黄州四年，他寻诗访友的足迹又为这里的人文历史图景叠加了一层清晰的文化经纬。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艺术与人文丛书”，大部分的选题来自鄂东地区，分别涉及传统村落、民居建筑、民间手工艺、民俗信仰、生产生活等领域。这些选题既可包括在现行高校学科体系下的美术、设计等艺术专业的实践范畴之中，也可纳入人类学、社会学思考的理论视域之下。丛书中的大多数学者都出身美术的实践性术科，在课堂教学和学术田野之间往来行走，因此这些选题是他们教学的延伸，自然取经“由技而道”的学术之路。

虽然这些研究还有些青涩，但却饱含着一个个热心人对于田野的激情和对于学术的执着，保持着一种与乡村社会接触过程中鲜活的感觉。

亲近田野就是一种学术优越。以宏阔的视野和高深的理论观照学术固然有高度，但与田野同在也有其亲近感。近些年来，黄冈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积极回应区域社会对于高校的呼唤，投身于鄂东黄冈的地域经济与文化建设中，把学术的田野划在鄂东大地上，把研究者的身影摆进地方建设的队列中。这里的年轻学者，一直行走在鄂东的乡村田野中。在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工程中，他们受惠于热心学者的帮助，陆续找到了各自研究的方向，也积累了一些成果。截至2019年，黄冈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师团队已经成功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艺术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省社科研究项目20多项。目前这些项目都在陆续结题，成果也在陆续整理中。为了赓续鄂东悠久而深厚的地域文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引领作用，学院决定甄选一批优秀研究成果，出版“艺术与人文丛书”，推动黄冈师范学院艺术与人文学科的建设，助力地方社会建设，实现高校的时代担当。

大别山从西向东奔来，在黄梅这个地方收住了脚步，驻足在长江边上，与对岸的锦绣庐山隔江相望。而江北的黄梅东山并不羡慕庐山的无限风光，却在自己的小山里涵养了禅宗四祖、五祖，

并从这里送走了一代宗师六祖慧能，东山因此有灵。地方高校的优势在于地方特色的彰显，在于担负起地方社会文化经济的任务。身处鄂东的年轻学者自觉走进乡村魅力田野，参照艺术人类学和中国乡村的研究范式，坚持以人文为视角，强调以艺术为对象，扎根鄂东社会，注重田野调查，努力从学理上探讨鄂东艺术与人文的相关问题，也为艺术人类学和中国乡村研究提供鲜活的学术个案和理论探究，逐渐走出了更大的空间。“艺术与人文丛书”的出版只是一个起步，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更好的成果涌现。

丛书主编 胡绍宗

# 目 录

## C O N T E N T S

序 言 文化的村落与村落的文化 / 1

### 第一章 空间: 整合的文化记忆

第一节 移民文化: 山地型村落的记忆 / 24

第二节 传统村落: 农耕文化的整合性空间 / 41

第三节 敬神与娱人: 青山柯庄宗祠的建筑空间 / 62

第四节 乡村的民俗现场: 民居堂屋中的图像与文字 / 78

第五节 赤壁山水: 鄂东地域历史与文化黄州的建构 / 91

第六节 文化的底色: 鄂东移民历史背景下的民间艺术 / 106

### 第二章 手艺: 生计中的文化传递

第一节 守俗与知性: 木作手工艺的记忆 / 118

第二节 管窑赤西湖的恩赐(一)——开泥 / 138

第三节 管窑赤西湖的恩赐(二)——刮泥与选釉 / 159

第四节 纸艺人生: 扎彩的生计与禁忌 / 177

第五节 英山缠花: 两代手艺人之间的“非遗”传承 / 189

### **第三章 农民画：手艺人的另类创造**

第一节 村落、家庭的社会转型：黄州现代农民画的“深描” / 209

第二节 手艺人的另类创造：黄州现代农民画三十年的创作 / 219

第三节 回归日常：农民画作为画乡民俗生活中的文化休闲 / 229

第四节 农民画与乡村社会：国家、地方和农民间的互动 / 240

第五节 “跃进农民画”：社会运动中被异化的诗性 / 265

### **第四章 仪式：在信仰和娱乐之间**

第一节 叠加与转换：唐家渡“五龙奉圣”舞龙灯节的仪式结构 / 280

第二节 “五龙奉圣”：民间信仰与乡村娱乐 / 300

**后 记** / 319

---

## 序 言

### 文化的村落与村落的文化

---

近十多年来，笔者经常有机会在许多地方的博物馆转悠，特别是一些地方性的小博物馆，包括各类纪念馆，收获很大。既满足了我对地方性历史文化的好奇心，还迎合了我固执而持久的怀乡与恋旧的心情。其实，在这份挥之不去的习惯中一直包含着一个很大的兴趣，那就是我会自觉不自觉地各类展览陈列中搜寻各地的老照片，尤其是那些清末以来拍摄的关于中国自然环境、乡村与城市环境的老照片。这些年走下来，我得到了一个大致印象：如果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从40年前开始，一直回溯，逛一逛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地，你会发现到处都是光秃秃的，<sup>①</sup>而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印象尤为突出。其实这种印象你也会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来华的那些人的影像文献里得到印证。这些历史照片中记录的现象为我们了解中国传统乡村景观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历史性情景。

#### 一、村落空间的生命

明清以来，传统中国农村人口和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学者研究认为，从明初（1368）到1968年的600年中，中国的人口增加了约七到九倍之多，而

---

<sup>①</sup> 由于明清以来的人口压力，山林过度砍伐，土地过度开垦，植被受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

耕地包括开发边疆、开垦山区总共才扩展了四倍。这种人和土地之间的矛盾取决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特点，主要依赖作物经济，而不是依靠消耗大量种植物的畜牧养殖业。然而，以作物为主的农业经济的特征却是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因为耕地总量不足，人们只有通过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实现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从而实现增加产量，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人口。单位面积的土地吸附了大量劳动生产力，从而形成明显的“内卷化”或者“过密化”农业生产模式。<sup>①</sup>

以土地为中心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决定着传统中国村落的空间格局和空间属性。一个绵延了几百上千年的村子，就在这种不变的节律中缓慢而安静地延续着。它既紧张又安定，唯恐打破乡村的平静而不能获得必要的生活物资，去满足依附在这个空间中的居民的基本需求。

中国传统乡村中这种“高危式”的平衡关系随着来自西方军事、文化与经济的冲击被彻底打破了。黄宗智在三卷本的《明清以来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中将乡村农业称为有机生产关系，将工业生产称为无机生产关系，并利用土地的产出率和人的劳动力之间的有机关系解释这种脆弱的平衡。他认为二者达到了一定极限之后，将会产生农业经济的边际效应，这种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状况深刻制约着中国传统乡村的发展。<sup>②</sup>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传教22年，1899年发表了《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他采用以小见大、以村见国的方式考察中国，村庄就是他把握中国的基本空间单位。他在书中所描述的一些现象虽然带有一个外来者的文化偏见，但书里村落的那些景象确是晚清以来中国乡村的缩影。

农耕文化逻辑下的传统村落作为乡村基本空间的基点，其肌体在一次次社

---

① 黄宗智：《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卷一，法律出版社，第2—3页。

② 黄宗智：《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法律出版社，见总序中的论述。



麻城大屋湾村口

会变革中被触动。从物质空间上来讲，对乡村的破坏就是对村落的破坏。梁漱溟说，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sup>①</sup>破坏乡村的力量与原因，主要表现为西方列强的侵略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中国政府与革命力量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变革；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国内的战乱与匪患；

---

<sup>①</sup>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页。

频发的自然灾害等五个方面。<sup>①</sup>近代以来，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社会制度与工业化的进程。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变法图强，发展工商业，成为社会的主流变革思想。近代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仁人志士都在致力于办工业、办商业、兴军务、兴教育。在救亡图存、再造社会、文化转型的现实命题的求索中，中国政界、商界与知识界精英前所未有地动员起来，探讨民族国家的出路。“商本”替代“农本”的历史趋势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历史进程中被反复强化，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

清末民初，乡村建设思想萌发。1926年后，乡建运动步入勃发期而直至30年代后，随着农村经济的日益崩溃，以救济与复兴农村为口号的乡村建设运动由讨论化为各团体的行动，形成一种强烈的社会运动，很快蔚为社会思潮并建构了多种理论与实践的乡村建设模式。<sup>②</sup>

中国乡村建设，无论就其思想史还是运动史而言，都自有其独特的内涵与时代特征。1949年前后，国家建设的历史序幕事实上业已拉开。随着革命向建设历史进程的转折，中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建设新中国的主导思想是以城市为重心，以工业化为主导，而开始工业化的重点却落实于城市建设方面。农业不能作为重心，它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必须把城市工业组织起来发挥领导作用，才能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sup>③</sup>在这样一种社会观念下，中国乡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表现出与历史时期不一样的风景。一方面，城市工商业不断快速发展，农村成为新中国工业化运动的人力、物力的输出基地，各种资源源源不断向城市、向工业输送；另一方面，农业作为对城市工商业有力的保障，农村社会高

---

① 王先民：《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百年演进（论纲）》，《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② 王先民：《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百年演进（论纲）》，《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③ 同上。

度组织化的集体生产也给这里带来了一些活力。

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十分热闹的地方，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口生活在这里。集体劳作的生产方式使得农业生产活动变成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体性活动，集体形式的生活为农民带来了许多有别于家庭个体劳作的乐趣。农民个人从血缘家族中的等级身份个体转换为社队集体劳动协作关系中的合作主体，从而突破了家族的局限，获得了更多的社会交往，享受了区域社会中更多共享信息。

1949年之后的二十年时期内，乡村各种大型集体性活动频繁开展。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群体性乡村社会运动，都为农民个体带来了许多社会交往的机会。尽管学界对此一时期中国农村集体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但不能否认的是以社队广播、群众会议、文化活动为纽带的集体文化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为乡村生活注入了活力，中国的人口总数也在这三十年里实现了翻番，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古老的村落变得异常热闹和拥挤。

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天，在任何社会里乡村都是居于不利的地位。<sup>①</sup>所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以法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为背景，写出了《农民的终结》一书。他在书中分析了欧洲乡村社会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变迁过程，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农民的终结”不是“农业的终结”，或是“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sup>②</sup>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大批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城务工，成为新时期城市建设中的“农民工”，并逐步融入城市成为新一代市民。

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空心村”、农田抛荒等现象出现，乡村又出现新的情况。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学者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我国农村的巨大变迁，李培林通过对广州几十个城中村的调查，呼应了孟德拉斯的思考，完成了《村落

---

①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21页。

②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